

# 後世俗視域中的文學、藝術和宗教

——第十三屆“神學與人文學”暑期國際研討班綜述

Literature, Arts and Religions in a Post-Secular  
Horizon: Review of the 13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趙 惊

ZHAO Jing

作者簡介

趙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O Jing,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ojingisme@gmail.com

## Abstract

From 18-20, 2017, the 13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was held in Kaifeng,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theme “Literature, Arts and Religions in a Post-Secular Horizon.” The Summer Institute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2th Trienni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s a round-table foru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within the CCLA Congress. More than 30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Israel, the US,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ere invited to present papers, discussing and exchanging views on The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Within a thematic framework of the “Post-Secular Horizon,” participating scholars presented papers in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from religious philosophy, biblical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Sinological studie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major concerns and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Institute, including post-secularity, ethics, critical theory, religious cinema, theological aesthetics, natural writings, literary figure studies, studies on (meta-)language, missionary Sin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ies. The Summer Institute demonstrated the best of academic efforts to reflect on the post-secular human and to engage with various questions in literature, arts and religion.

**Keywords:** theology, humanities, post-secula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7年8月18日至20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辦，河南大學協辦的第十三屆“神學與人文學”暑期國際研討班在河南開封隆重舉行。本屆暑期國際研討班同時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十二屆年會的一個圓桌論壇——“比較文學與宗教研究”，來自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臺灣輔仁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30多位國內外學者發表主題演講，並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學術對話。

本次論壇主題為“後世俗視域下的文學、藝術與宗教”。近世以降，人文主義自神學環境中的穎脫而出造成了深刻的社會歷史變革；時至今日，聖神遠逸，政教析離，傳統式微，個體爭輝於普遍，理性凌越乎信仰，一個世俗時代已清晰可辨。韋伯針對世俗化的經典論斷言猶在耳，哈貝馬斯、泰勒等思想家則以“後世俗”的名義揭櫫了全新的時代性思考：如何在對現代性之諸多成果予以繼承和守護的同時，在公共領域內重新激活傳統的靈性資源，實現人文學和神學之間更為深廣的交往與對話，從而修補世俗化生命在超越維度上的根本缺損？針對世俗化的全面“除魅”，在文學與藝術中或可見證一種後世俗的“返魅”——自然中神聖再顯，形象中生命與意義重逢；同時，哲學與宗教從近似的處境出發，直面神性或人性的他者，尋求世間而內在的超逾，或亦達致相同的思想境地。而在時下人文學術話語的系譜中，各路“後學”昌明盛熾，自不待言。有所取於後學之靈活通脫（而非其漫漶無涯），對傳統中艱深嚴肅之處假以充分化用，即立身於後世俗性，着眼於世俗之“後”，而從文學、藝術與宗教的研究中獲取思想與啟迪，這也是本次研討班的主題命意所在。

經過歷時三天、總計六場的專題論壇研討，與會30多名學者圍

繞會議主題，在廣闊的學術視野下進行了跨學科、跨語言、跨信仰的積極研討，所涉領域包括：宗教哲學、聖經研究、文化研究、比較文學、漢學研究等，具體涉及的話題有：後世俗性、倫理學、批判理論、宗教電影研究、自然文學研究、作家及作品研究、形象研究、神學解釋學、神學美學、語言問題及元語言理論、語言與文化身份研究、傳教士漢學、經典翻譯、比較經學與後結構主義理論等。緊湊而充實的學術對話，用切近的思考回應了時代問題，以文學與藝術濡潤了深奧的理論，讓深藏於歷史塵霾中的生命重現光采，也從經典中古老的疑惑中煥發出新知。

## 一、宗教研究、後世俗性與比較文學

神聖、世俗與後世俗之辯，不僅是歷來宗教研究的主要議題之一，同樣是哲學、文化研究以及社會歷史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反思視角。臺灣輔仁大學曾慶豹教授緊扣會議主題，其論文《論世俗時代與宗教現代性——泰勒（Charles Taylor）的論點》扼要地闡述了泰勒在《世俗時代》中提出的觀點：在內在性（immanence）框架的遮蔽下，現代性意味着上帝與宗教信仰被某種自負的人文主義（exclusive humanism）所替代，後者則會抹殺生命之外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 beyond life）。宗教從身體與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離去，可以用“離肉身化”（excarnation，即基督教“incarnation”概念的反面語）一詞來形容，新教的改革即帶有這一特色，並將其擴展到近代西方的自我概念。為對治現代性的諸多弊端，泰勒提出了“大公現代性”（Catholic modernity）的概念，意欲回歸καθ' ὅλου（Catholic的字根）概念的雙重意涵——即兼顧“普泛性”與“整全性”，不再執着於“基督王國”（Christendom）這一歷史概念，而在承認多元性的前提下向超越性保持開放。曾慶豹借此提出了“深化在地化”的看法，探討了如何推進利瑪竇的歷史經驗，讓宗教生活通過世俗社會而向超越性保持

開放的可能性。

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教授的論文題目為《從後世俗的視域詮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文章指出，宗教傳統上對《路加福音》中好撒瑪利亞人故事（The Good Samaritan）的闡釋，大多具有濃鬱的一神論色彩，如馬丁·路德指向基督中心論的寓意解讀。然而基於故事文本的分析，可發現經文本對於“慈悲”和“憐憫”有特殊的重視。有不少生物學家往往將表面“利他”的行為歸結為有助於存續物種、傳播基因的“利己”行為，這種觀點忽視行動者的動機和感受，有時過於極端地以世俗化的世界觀解釋生命，自有其局限性。賴品超繼而轉向了社會生物學家巴特森（C. Daniel Batson）對於利他主義的研究，後者試圖證明人類（乃至於許多靈長類動物）在生物本性中即存在某種利他的同情心。他認為，巴特森的研究可與孟子關於“惻隱之心”的論述交相呼應，二者皆在人性中尋得了某種向超越性開放的同情心，既不局限於某一宗教領域，又有別於世俗主義，因而構成了後世俗的立場與解釋。

安徽大學鄭鵬博士的發言題為《世俗批評、宗教批評與經典：從後世俗的視角再觀薩義德的批評觀》。薩義德（Edward W. Said）區分世俗批評和宗教批評，並着力肯定前者貼近現實，指摘後者的神秘色彩。基於馬克思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傳統，薩義德在美國1980年代的“經典之爭”中鮮明地表達了反精英主義、反經典封閉、支持多元化的立場。鄭鵬繼而指出，近年來多元主義的勝利卻滑向了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人文主義的真理反而隱匿不見，這是薩義德本人始料未及的。為矯治這種流弊，將薩義德的批判觀重新理解為某種不自察的複雜異教思想，或許是一種有益的後世俗主義嘗試。

中國人民大學陳濤博士的報告題為《後世俗視域下的中國當代電影：佛教的再現與挪用》。作者思考了佛教元素如何以一種“返魅”的方式進入大眾視覺文化領域並形塑人們的觀看、消費和審美，以及這一過程所表現出的中國電影的文化癥候。陳濤指出，佛教因素在電

影中的返魅呈現為魔幻、商業噱頭、異域奇觀等形態，卻缺乏對終極問題的追問，總體上仍處於邊緣化狀態之中。從後世俗視角出發，佛教電影如想對抗意義領域的慢性枯竭，在形塑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進程中貢獻積極力量，須在藝術理想和思想深度方面再做努力。

作為人文學科中的重要一員，比較文學以其善於從事跨學科研究、涉獵廣博而著稱，本次研討班有幾位學者從比較文學研究出發，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神學或宗教議題。河南大學邱業祥教授在其論文《超越作為特殊性的宗教：莎士比亞與聖保羅的普遍主義——以〈威尼斯商人〉為例》中，先借助巴丟（Alain Badiou）、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的解說重構了保羅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又對莎劇《威尼斯商人》的情節作了分析：夏洛克和安東尼奧的衝突以及雙方事實上的不寬容表明，在一個商貿發達，各民族、各宗教廣泛交流的嶄新時代裏，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成為了有待超克的特殊性。莎士比亞力圖構建的普遍主義乃是基於和源於普遍的自然人性，既伸張了世俗幸福和共情原則，同時主張將宗教限制在私人領域，在公共生活領域中遵循公共規則和法律。

中國人民大學趙偉博士的報告以《文學與宗教之間的“神女”形象》為題，闡述了以“神女”對譯西文“nymph”的內在可能性與合理性，又對各類神女故事中的基本敘述因素（mytheme）作了提煉。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他揭示了古代神女形象背後的宗教背景，同時指出，唯有通過“文學性”的方法，神女形象中蘊含的陰魅可怖的一面方可以得到升華和轉化。

廣西民族大學李忠敏博士的論文題為《庫切〈耻〉中的替罪羊及其功能》。論文分析了庫切（J. M. Coetzee）對替罪羊文化原型的運用：被動受難的形象彰顯了集體或個體暴力的存在；李忠敏認為，庫切筆下的替罪羊形象同樣具有救贖功能：人祇有主動承擔起個體的苦難和責任，學會忍耐和虛己，才有可能走出權力所主導的歷史的戕害。

蘇州科技大學徐文博士的論文《從“光”意象管窺羅伯特·勃萊的“深層意象主義”》以羅伯特·勃萊（Robert Bly）在《湖上夜釣》一詩中使用的“光”意象為例，分析了“深層意象”的生成過程：“光”和燈一起以物質的形式出場，後逐漸脫離物質性，變得抽象，隨着心理能量的深化轉移，最後變成一種連接意識與無意識、溝通內外世界的“深層意象”。徐文認為，“深層意象主義”不僅建構了一種健康的審美認知心理，其中也包含着對現代人性的批評，提倡了全新的文化價值。

信陽師範學院柳世軍博士的論文《後世俗主義視域下朗費羅詩歌的“神聖”與“世俗”闡釋》圍繞着會議主題，並對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詩歌作出了解讀。他認為，朗費羅的詩歌以建構“神聖”為主旨，以“世俗”為服務對象，克服了聖俗之間的二元對立，使二者互利互惠：詩歌融入大眾讀者的生活，宗教的倫理亦得傳揚。

## 二、神學詮釋學、神學美學、語言問題與傳教士漢學

西方哲學歷來與神學傳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現代哲學巨擘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人那裏，神學思想的背景往往若隱若現。針對這一問題，香港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同濟大學教授林子淳博士發表了題為《語言作為詮釋學普遍性的基礎——為何伽達默爾要使用神學？》的主題演講。論文集中探討了《真理與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第三部分的“語言轉向”，尤其是“語言與話語”（*Sprache und Verbum*）一章，詳細闡釋了為何伽達默爾要在至關重要之處微妙地使用了神學資源。細讀文本，可知伽氏將詮釋學經驗建基於基督論-人類學，即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理解的道成肉身和三一論思想。格朗丹（Jean Grondin）發明了其中的奧古斯丁資源，抓住了“內在話語”這一關鍵，卻在詮釋學經驗之普遍性問題上猶有未竟

之處。亞托斯（John Arthos）和奧利花（Mirela Oliva）分別將問題聯結到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及庫薩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nus），以多元的神學資源豐富了這場學術討論。在此過程中，內在話語問題得到了透徹領會，而最終詮釋的普遍性則須落實到人類語言的事物聯繫之中，這正好回歸了現象學的傳統。林子淳認為，伽達默爾使用道成肉身、三位一體等神學舊題，並非執着於其教義內容，而是借用其思想結構，針對沉迷於內在話語的希臘邏各斯傳統構成一種重要的補充，並以這種充實具體的語言概念作為詮釋學的中介，向實踐知識和生活世界保持開敞。

北京語言大學張華教授的論文《文學：教會與社會之間——美國自然文學的神聖視域》力圖在美國自然文學中探索神聖空間與公共空間——即教會與社群——之間的關係。借助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獨白”（monotone）、“複調”（polyphony）、“衆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分析框架，張華對惠特曼（Walt Whitman）、繆爾（John Muir）、迪金（Roger Deakin）這三位自然文學作家加以細緻分析，並探討了他們各自與讀者交往的方式——引導讀者、教育讀者、建立可供讀者相互交往的“生態張力場”（ecotone）。張華認為，“自然”與“他者”常常被讀出“神聖”，而這恰恰是文學所賦予的。在這一過程中，文學着實具有連接教會與社會、宗教與世俗、神聖與公共、神學與人文學的紐帶與橋梁功能。

自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七卷巨著《主之榮耀：神學美學》出版以來，國際學界興起了“神學美學”的研究熱潮。在題為《神學美學：後現代語境下形象與意義的重逢》的報告中，中央民族大學宋旭紅教授回顧了20世紀神學美學的發展歷程，並指出：形而上學衰頹以來，藝術在“無意義”的指控下反而更加迫切的尋求“意義”，是為神學美學興起的原因所在。同時，神學將各種藝術作品理解為“形象”（imago），並不斷學習着形象化、藝術化的表達方式。而在標新立異、解構狂歡的後現代處境中，藝術卻逐步走向了意義消



解的廢墟狀況。宋旭紅認為，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藝術或形象如想重新尋回意義，就不得不注目於神學，而這無疑會對神學美學的再度繁榮帶來希望與契機。

20世紀人文學術的“語言轉向”已是不容置辯的事實。從後世俗的角度重思文藝與思想，語言是一大關鍵。在題為《喀巴拉神秘主義視角下的本雅明元語言論》的報告中，北京語言大學陳影博士介紹了猶太教喀巴拉傳統（Kabbalah）如何以語言為途徑解釋並挽救傳統。植根於這一傳統，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世界起源與最終救贖的秘密全部隱藏在原初的純語言中，現代性祇能與“墮落”相提並論。其關於純語言、名稱及翻譯的思想，可看成是一種對本源的記憶和一種在語言神學層面上開展的彌賽亞回歸。

浙江外國語學院陳蕓博士以《“更微妙的語言”——論查爾斯·泰勒對裏爾克詩歌的詮釋》為題，撰文探討了浪漫主義詩歌語言問題。她指出，“更微妙的語言”（a subtler language）是理解泰勒詩論的關鍵語，而後者又以對里爾克詩歌的解讀為基礎。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等浪漫主義詩人們試圖建立一種具有“建構性、啟示性的語言”，在明確給出對象特徵之前，採取修辭手段，利用微妙語言的模糊多義，以世俗形式言說宗教內容。而在後世俗時代中，失去了存在鏈條、神聖秩序的參照系，詩性語言變得極為脆弱。

北京語言大學柳博贊博士則將語言問題拓展到地緣政治、宗教及歷史語境下。在題為《亞述與亞蘭之爭——敘利亞語族群的民族認同問題》的報告中，她追溯了敘利亞語基督徒（Syriac Christians）這一古老群體的演變歷程，縷述了東方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敘利亞正教會（Syriac Orthodox Church）以及迦勒底天主教會（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各自獨立發展的歷史經過。19世紀英國聖公會將敘利亞語基督徒的民族身份認同為“亞述”（Assyrian），而經歷了20世紀一系列社會歷史事件之後，敘利亞正教會又重新採納了“亞蘭”（Aramean）的身份認同，並為此與東方教會產生了爭執。柳博贊總結

道，在民族身份的形成和認定過程中，相較於語言、習俗或文化等因素，宗教（尤其是政治化的宗教）因素往往會起到核心作用。

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中，傳教士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從後世俗視域重思傳教士活動及其學術成果，也是本次研討會的一個重要板塊。濟南大學劉麗霞教授的《包貴思與燕京大學現代作家群》一文圍繞20世紀前半葉燕京大學美籍教授包貴思女士（Grace M. Boynton）的職業生涯，介紹了包氏與燕大作家群——如基督徒冰心、共產黨人楊剛、反教會者蕭乾等人——超越信仰的交往，也借此說明了燕京大學作為教會大學獨特的文化傳播功能。

借助傳教士漢學研究中國之於歐洲乃至全世界影響，也是一條重要的研究路徑。上海師範大學紀建勳博士的文章《誰的“上帝之賭”？——帕斯卡爾與中國》即是這樣一篇追溯之作。耶穌會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的《天主實義續篇》中論證上帝存在的“上帝之賭”與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在《思想錄》中證明上帝存在的“打賭說”無論在邏輯上還是篇章結構上都非常相似；基於這一發現，紀建勳參鑒帕斯卡爾《外省人信札》、衛匡國《中國上古史》等著作，評估了駐華耶穌會士對帕氏施加直接影響的可能性，還將帕斯卡爾、萊布尼茨及耶穌會士看作一個相互影響的複雜三角，並對近代中國社會宗教的文化品格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 三、翻譯研究、比較經學、思想史與理論研究

翻譯是文化傳播與交流的最基本媒介之一，也是神學和人文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課題。本屆研討班一如既往，對翻譯問題，特別是傳教士漢學家對中國經典的翻譯工作傾注了大量學術興趣。上海師範大學丁大剛博士認為，聖經翻譯中的“譯名之爭”其實在19世紀末期已經實質解決：以“上帝”對譯西文“God”，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認可。其《理雅各解決“譯名之爭”的社會學闡釋》一文援引拉托（Bruno

Latour) 的社會學理論，提出知識領域的爭論往往憑藉“權威”和“劃界”(boundary work) 兩種方法來解決。丁大剛指出，1877年以後，理雅各大力推崇儒家的宗教性，將譯名之爭的角力場域由傳教領域轉向了比較宗教領域，最終確立權威、實現劃界，事實上解決了“譯名之爭”，客觀上也促進了“儒教”概念的發明。

中央民族大學高志強博士報告了他對循道公會傳教士翻譯家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的研究。在《略論蘇慧廉“全新”的《論語》譯本》一文中，他強調了漢學傳承的概念，指出蘇慧廉翻譯《論語》，是為了更新理雅各已經不再受學生重視的舊譯本；他分析了蘇譯本的影響來源，指出後者受到殷鐸澤譯本、馬士曼譯本和理雅各初版譯本的影響；高志強最後以“孝”的翻譯為個案進行了譯本比較，並指出：蘇慧廉的譯文更多是一種承續，並沒有超越理雅各的翻譯。

比較經學研究是近年來新興的一個學術領域。有關學者植根於傳統文獻，發揮比較思維，實踐跨學科性，廣泛借鑑了中西學界的各種成果，為本次研討班貢獻了富於啟發性的論文。在《缺席之“作”與替補之“述”——孔子“述而不作”說的解構維度》一文中，上海師範大學郭西安博士以法國後結構主義思想——如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作者理論、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關於起源與替補的討論——為理論框架，在較深刻的層次上重新估量了中國經學與古典詩學觀念中的“作”“述”關係。她認為，傳統上“作”被賦予了起源與創生的權威地位，對“作”的推崇和保護關聯着經學話語的內在矛盾性，既決定了“作”必然召喚“述”，又標舉着對增殖與多義的壓抑，與此吊詭過程相伴隨的便是一方面對孔子“述而不作”不斷重提與強調，而另一方面卻潛在策動着“明述實作”的話語實踐。然而，由於“作”從根本被維繫於天道這一終極起源，從來不曾完滿在場，現世所湧現之“述”對其的遵循和顯明就成為一種實質上更為本源的替補運動。在經學話語場中，正是“述”生產出了其所聲稱要補充之

“作”的可能性。郭西安總結指出，“孔子作《春秋》”與“孔子述而不作”兩項經學聲明聚焦出兩種話語管控機制，即作者原則與注釋原則，兩者緊密互動，在控制話語的同時也催化了經學話語實踐的流變與多樣。

作為希伯來聖經中的重要篇章，“以撒捆綁”（Akedah）的故事幾千年來為歷代學者、注釋家、思想家、作家所重視，聚集了關切的目光，也造成了深刻的困惑。在題為《殺不可殺——以撒捆綁與豫讓故事中的被揀選性》的報告中，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張平教授列舉了祁克果、列維納斯、德里達對這一故事各自的解釋，而屬意於卡夫卡凸顯人間氣息、富於反諷色彩的演繹，並借此提出了問題：如何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理解以撒捆綁？張平採取了比較研究的方法：他對以撒捆綁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豫讓刺趙襄子”的故事進行了比較，從二者“殺不可殺”到“不殺”的情節演變中，以“被揀選性”（chosenness）概念為核心，分析了希伯來傳統中“聖經揀選”（biblical chosenness）與中國傳統中“擇為知己”（*zhiji* chosenness）的異同。張平分析道，亞伯拉罕和豫讓面對“殺不可殺”的指令，無論是服從抑或抗拒，都會陷入悖論而喪失“被揀選性”；唯有遵從基於“或然性”的三種法則——實用主義法則（回報大於成本）、替補法則（以羊替換以撒、以趙襄子之衣替換本人）和同意法則（以撒甘心犧牲，趙襄子釋放豫讓）——主人公才能既避開可怕的故事結局，同時維繫自身的被揀選性。

思想史及批判理論的研究，經常會涉足文學、歷史、宗教及哲學的交叉地帶。前者追問既往，以期為龐雜的精神成果勾勒出清晰的脈絡；後者立足當下，力求直指人心、衝決網羅，探索思想的潛在可能。本次研討班有三位發言人的選題屬於這一領域。河南大學博士候選人侯春林在《神聖與世俗之間——“卡理斯瑪”一詞的演變》一文中追溯了卡理斯瑪（“*χάρισμα*”）一詞在保羅那裏的本義和原初語境，又探討了韋伯（Max Weber）對這一詞語的重新發現與再創造——

“依靠個人超凡能力的權威類型”。20世紀下半葉至今，專業術語“卡理斯瑪”（charisma）逐漸成為西方社會文化生活的常用詞匯。侯春林認為，通過對“卡理斯瑪”演變的梳理，可以發現耶穌和耶穌運動兼具神聖與世俗的雙重性質。

中國海洋大學殷振文博士的論文《柔弱思想——理查德·羅蒂與反諷概念當代釋義》是一篇概念釋義之作，文章以古典時期的蘇格拉底反諷為背景，重點分析了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對反諷概念的當代解讀和重新運用，揭示了反諷的懷疑論、多元論和反形而上學等當代意涵。殷振文還將反諷修辭與賈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柔弱思想聯繫起來，將反諷重新闡明和定義為交談的謙遜、寬容和柔弱。

中國人民大學汪海博士的報告題為《親密中的間距：布朗肖論我與他者關係的不可能性》。他指出，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在《總體與無限》中提出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是一種非對稱、非互利、且不構成任何總體的關係，哪怕在親密的核心也仍然保持着無法取消的絕對分離（séparation）。在此基礎上，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解構了列維納斯可能保留的形而上學框架，提出了一種以“中性”思想為中心、既反人本主義、又反傳統宗教觀的無神論他者概念。